

## 黑格尔与皮尔斯的反基础主义知识观\*

杨兴凤/文

**提 要：**黑格尔为知识问题所提供的观念贡献（从“社会-推理-历史”三重结构来说明知识）成为匹兹堡学派的思想资源，在他们那里，黑格尔被当作是实用主义者。实质上，黑格尔哲学在知识问题上的反基础主义特征已被“实用主义之父”皮尔斯引为“我的哲学是复活黑格尔”。皮尔斯与黑格尔在认识问题上的反基础主义追求是相通的，但这两者在这个问题上体现的哲学气质差异也是明显的，从两个大的方面可以窥见不同：从认知主体上，“科学探究的共同体”VS.“历史文化的共同体”；从认知目的上，“世界实在结构的一致性揭示”VS.“精神（意识）的自我认知”。探讨黑格尔与皮尔斯在知识问题上的同与异，为当代新实用主义的黑格尔兴趣提供一个溯源性的说明。

**关键词：**反基础主义；黑格尔；皮尔斯；知识观

**中图分类号：**B516.35

**文献标识码：**A

当今英美哲学界不断增长着对黑格尔的兴趣，他为知识问题所提供的思想资源成为分析哲学激活黑格尔的重要一环。黑格尔哲学的去先验化特质、整体主义承诺、认知的动态主义所显示的实用主义气质在当代哲学家的思想中正在发酵，这在匹兹堡学派的思想家们那里得到清晰印证（布兰顿就明确表示黑格尔从“社会-推理-历史”的结构来说明知识，这给予他根本性的启示）。实用主义之父皮尔斯的反基础主义诉求与黑格尔所要实现的哲学目标是相似的。实用主义从古典到新分析阶段的历程，引导我们在黑格尔那里发现其思想的实用主义维度，甚至发现一种“黑格尔主义的实用主义”。论文通过揭示皮尔斯与黑格尔在知识问题上的共同诉求（反基础主义）与呈现出的差异（认知主体上“科学探究共同体”VS.“历史文化共同体”、认知目的上“世界实在结构的一致性揭示”VS.“精神的自我认知”），为当代英美哲学的黑格尔兴趣力图作出一个溯源性说明，同时也力图对皮尔斯和黑格尔哲学之思想矿脉的持久能量进行揭示。

### 一、黑格尔的反基础主义知识观

认识论上的基础主义策略奠基在两个基础的支撑之上，心灵作为其中一极，世界作为另一极。它呈现出类似于R. 罗蒂所称的“镜式”哲学模式，以及相应的旁观者哲学。认识论

---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从圣路易斯学派到匹兹堡学派黑格尔主义的实用主义化研究”（项目编号：17BZX080）的阶段性成果。

的基础主义反映出传统哲学“逃避时间”的传统，即总是在寻求一种不变的、恒定的、本质的终极因素作为确定性的奠基，这使得这种哲学传统在知识问题上呈现出表征性、非过程性的、不可修正的特质。笛卡尔哲学是这种认识论上的基础主义的一种模板。康德哲学是这种模板的一个演变版本，他用意识的先验结构作为基础来保障知识的普遍性必然性。拒绝康德哲学的这种基础模式的人认为，从社会意义上解释对认知对象的建构才是正确的路径，这条路径上的思想家包括黑格尔、马克思、狄尔泰等，他们分享了一个基本见解……就是我们不可以从一个阿基米德点来解释我们的世界。<sup>①</sup>

### 1. 耶拿基础主义批判的影响

18世纪90年代的耶拿，已经有一群年轻的思想家开始批判基础主义，这种批判也被称为公理批判（Grundsatzkritik），他们批判矛头主要指向费希特等将康德的批判哲学奠基于自明性第一原理之上。黑格尔清楚公理批判的核心原则和基本主张，这对于他自己的哲学的方法论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对于第一原理的拒斥、对系统性的强调，以及对哲学中运用数学方法的不信任，都是公理批判的直接影响效果。<sup>②</sup>从总体上看，黑格尔对基础的批判体现为以下主张：第一，对于直接性的拒绝，即知识不可能诉诸于直接的经验、自明的智性直观来获得。第二，奠基的“第一原理”无论是分析的还是综合的，都不能证明其基础地位：如果是分析的，知识会成为对第一原理的无结果的演绎；如果是综合的，它会受到归纳不完全的怀疑质疑。第三，“第一原理”必然是普遍的，但它的普遍性首先会使它失去对具体经验的包含力与解释力，其次会使它陷入作为形式的、逻辑的普遍与质料的、内容的具体之间的矛盾关系。耶拿的基础主义批判氛围成为黑格尔创建自己的哲学体系的精神基础。

### 2. 在知识客观性问题上的反先验性

当我们在反基础主义的路径上描述黑格尔的哲学时，就能理解他对康德哲学的批判核心。首先，拒绝康德对认知者的先验结构的设定，黑格尔否认任何类似于康德形式的关于经验和知识条件的先验演绎。对黑格尔来说，认知者是一个在经验过程中成长的主体，先验结构的设定是神秘的、不可思议的，所以，必须对康德哲学进行去先验化。

其次，知识的客观性不是由康德设定的先验主体的结构来保证，物自体的存在使康德无法将经验性的产物赋予真正的客观性；黑格尔认为，真正的客观性是由一种具有共在结构的“周围理性”的框架来保证。也就是说，知识并非建立在个体理性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理性的（或精神的）、社会的混合而成的框架基础上。换言之，人类知识建立在一个由多众构成的社会的特定历史时刻所采用的标准之上，即实践上。对黑格尔来说，我们无法辨别哪些主张现在和未来永远是正确的，我们只能辨别出知识在历史时刻的真实情况，即知识是在不能与社会隔离的共同概念框架中产生和被接受的。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贡献就在于，不仅重新制订了思想之真正客观性基础，而且将历史性原则决定性地引入哲学思考中。<sup>③</sup>年轻的杜威被黑格尔哲学吸引的重要原因就在于黑格尔哲学对知识的客观性的界定中那种生命感、动态主义和有机关联视野。黑格尔认为，所有事物都是在过程性中展开自身，包括最高的绝对精神也是如此，因此要破除那种以固定僵化的锚点思维来理解世界的理路，服膺于先验性的脆

<sup>①</sup> Cf. Manfred Frank, *What is Neostructuralis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p. 87.

<sup>②</sup> 参见弗里德里克·拜塞尔：《黑格尔》，王志宏、姜佑福译，华夏出版社，2019，第27页。

<sup>③</sup> 参见吴晓明：《黑格尔的哲学遗产》，商务印书馆，2020，第21页。

弱就在于拒绝辩证转化过程的痛苦，从而也真正拒绝了获得真正的客观性理解。

最后，黑格尔否定传统经验主义依赖于直接经验作为知识来源与保证的标准，也否定康德式设定了先验结构与物自体世界的经验主义分析路径，黑格尔走的是第三种经验主义路径：他否认我们可以独立于概念框架而认知孤立的事实，知识并不会以直接经验的形式而为认知主体所获得。黑格尔把在康德那里构成限制的东西不思考为是外在的，而是将其包含在理性的自我发展中，“直观也必须被思考”。<sup>①</sup> 直观与概念之间是具有连续性的，真实的认知过程中没有直接所予。这种思路被塞拉斯在其代表作《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中直接引为批判基础主义的同路人。

### 3. 知识在本质上的社会实践性

强调实践的首要性也是黑格尔与实用主义共享的反对笛卡尔式基础主义的路径。在黑格尔那里，实践首要性强调是与他的内在与外在辩证法相结合的，这种结合可以强有力地破除笛卡尔主义的心灵与世界的二元论及两者的实体性。作为实践主体以及知识发生地的心灵并不仅仅是单个的、具有内在与外在辩证运作的意识结构就完成的，人类不仅仅是具有意识的存在，它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而这种反思性的自我意识是在与其他自我意识对抗中形成的。黑格尔用主奴辩证法完成了这个“自我之成就”的论证。所以，正如 R. 布兰顿所发现并表述的“自我意识是一项社会成就”，<sup>②</sup> “一个主体在与他者共在之前，不可能具有一个自我，自我意识只有遇见他人之后才出现。”<sup>③</sup> 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还揭示了笛卡尔心灵概念所具有缺陷的补正方案：第一，心灵（或自我）是发展的产物，没有从一开始就完成了的心灵；第二，心灵是社会性的，它必须与其他的心灵的互动来发展和维持。更重要的是，黑格尔的承认结构说明了有生命的有机体要成为理性的存在需要一个过程，通过社会互动学习如何参与到相互承认的关系结构中，从而实现具有实践能力的真正个体。这样的过程彻底地打破了笛卡尔传统那个自我封闭的、具有固定不变性质的思想实体的“我”。

在阐明了与笛卡尔传统不同的心灵（或自我）之后，再审视“实践”这个概念，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它的规范性本质。自我既然是“一项社会性成就”、是在交互过程中活动，这即是说，自我是一个人在做事情。做事情是带着意图与评价而进行的一系列行动，它是带着对与错、适当与不适当、理性与非理性的随生意义的，简言之，这是“是什么”与“应当是什么”之间关系的理解的结果。所以，理解规范性对理解自我本质（心灵本质）至关重要。而这个关键点，是实用主义者们与黑格尔具有一致性的地方。

实践性原则标识出黑格尔哲学从本质上对抽象的拒绝，这无疑也是实用主义哲学家们所共享的基本原则。哲学史上理性观念的考察史常常被导向对现成的（同时也是静态的）知识的考察，并据此而得出关于理性的抽象结论。黑格尔拒绝任何形式的抽象，并认为这种坏的抽象源自于人们对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理解。他认为理性的所有形式已经在所有层次上实现于世界之中。<sup>④</sup> 黑格尔对抽象的拒绝给认知史带来了一幅历史图景，从而将知识置于某

① 黑格尔：《哲学科学百科全书 II·自然哲学》，刘哲译，人民出版社，2021，第 15 页。

② Robert B. Brandom, “The Structure of Desire and Recognition”, *Philosophy & Social Criticism* 1 (2007): pp. 127 - 150.

③ Robert Brandom, *Making It Explici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41.

④ 参见汤姆·罗克摩尔：《黑格尔：之前和之后》，柯小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 67 页。

个具体的社会情境当中，使真理获得了时间性的注视。知识发生在具体的社会情境过程中，是与现实生活打交道的人们的实践结果，这表明了思想与语境之间的必然联系，也表明哲学与历史之间的关系。黑格尔强调的这种联系使实践性原则从此压制住了抽象思辨的象牙塔式理性，思想拥抱现实与知识不离情境成为黑格尔哲学之后的哲学思考范式。这种思考范式使心灵不会停留在笛卡尔式意识哲学传统的内在性中，而需要通过外在行动在世界中实现理性。在黑格尔的辩证图景中，内在和外在没有分离的，内外通过言说出来的语言和表现出来的行动而统一，而语言和行动表现的“客观精神”，最终突破了个体的局限性。“个人只有通过否定自身，外化和教化才能达到普遍。”<sup>①</sup> 这种普遍性是精神概念确立的标识，也是黑格尔哲学“去先验化”“反心灵主义”哲学精神确立的标志。在哈贝马斯的考察中，黑格尔正是借助“客观精神”概念走出意识哲学的唯心主义困境的。<sup>②</sup> 在这里，我们看到黑格尔用“具体的普遍”这个于他而言最重要的逻辑范畴标识出每个人既是作为人也是作为个体同时也是共同体成员的辩证结构，从而将普遍、特殊、个体这些逻辑范畴与相互承认的社会基础结构联系起来。这样辩证结构的个体在语言、劳动和承认的中介中解释着客观精神，而在这种实践性视野之下，知识是言语着和劳动着的人们与世界打交道的实践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黑格尔是一个反基础主义者，黑格尔反对认识论基础主义的思想基调，在古典实用主义那里得到了延续和回响。

## 二、皮尔斯的反基础主义知识观

按照 T. 罗克摩尔 (Tom Rockmore) 的论述，皮尔斯将实用主义定位为一种对知识的后基础主义讨论：“美国实用主义是在皮尔士的见解和其他见解中形成的，而皮尔士对它的巨大贡献是双重的。一方面，他决定性地反驳了笛卡尔的基础主义——对知识的主要的、仍然是最有影响的现代探讨。另一方面，他勾画了一种非笛卡尔式的、后基础主义的知识观，一种相反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知识观。”<sup>③</sup> 皮尔斯的实用主义认知方法的核心最初就是源于对笛卡尔的批判，并在此后对康德哲学进行符号学改造。

### 1. 对笛卡尔式认知基础主义的批判与改造

笛卡尔与皮尔斯的方法最大的不同在于，笛卡尔要寻找到真理的绝对基础，而皮尔斯则是用科学探究逻辑再结合我们所做的假设从而产生出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的结论。皮尔斯更关注的是知识的实际发生过程，而不是对知识基础的怀疑性分析。

首先，皮尔斯批评了笛卡尔据以建构起“我思”哲学的著名“怀疑”。皮尔斯要求我们区分真正的怀疑和虚假的怀疑，这种区分有助于人们考虑一个知识探索的真实过程：我们实际具有的成见这个起始点。皮尔斯认为：通过怀疑一切的清理不能成功，人们是生在一个信念交织成的符号之网中，思考（怀疑）一发动，就是在动用既有的符号系统进行思维活动，不可能不用任何先在的符号就进行思考。认知活动是一个动态的探过程，它的起始点是既有的信念，通过具体的怀疑（有理由的怀疑）排除假的信念，从而不断地向真理靠拢。整个

<sup>①</sup> G. W. F. Hegel, *Jenaer Systementwürfe III*, Neu hrsg. Von Rolf-Peter Horstmann, Meiner, 1987, S. 234.

<sup>②</sup> Cf. Jürgen Habermas, “From Kant to Hegel and Back Again-The Move Towards Detranscendentaliz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2 (1999): pp. 129 – 157.

<sup>③</sup> 汤姆·罗克摩尔：《在康德的唤醒下：20世纪西方哲学》，徐向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105页。

认知过程呈现的是怀疑——探索——信念这三个环节的不断循环。而黑格尔对于笛卡尔式近代怀疑主义的解决办法是“用知性在辩证法的名义下替代了怀疑主义。”<sup>①</sup>

其次，皮尔斯对笛卡尔检验真理的标准进行批判。在皮尔斯看来，笛卡尔的标准等同于“清楚明白且深信不疑的东西都是真的”，据此方式，把个别的“我”当作真理的绝对评判者，这会使个人成为知识的中心，而这是皮尔斯所反对的。对皮尔斯来说，依据探究逻辑不断进展的探究共同体的验证和辩护才是知识合法化的途径，这就意味着这是一个多众参与的共同体事业。因此，作为关于实在的断言的知识：“是信息和推理迟早会达到的东西，实在因而不是取决于我和你的异想天开。所以，实在概念的来源本身表明，这一概念本质上包含着一个共同体的观念。这个共同体没有任何确定的限制，而且能够确定地增长知识。”<sup>②</sup> 因此，知识的主张绝不会是个体的，知识的辩护也是公共的。皮尔斯在其符号学的三元结构基础上提出了解释共同体的主张。解释包含着一种三元关系：解释者、被解释对象、接收解释者，而且这三者的位置是可以在不同情境中互换的。每一个符号都有这种三元结构，每一个知识主张也都是在这种三元结构中产生意义。在皮尔斯看来，解释共同体的符号互动包含着我们的同类及我们的精神生活，它是意义衍生行为的无限序列。在这里，我们发现一种超个体的解释共同体的假定与经验的最终有效性的探究共同体假定之间的会聚。

再次，皮尔斯反对笛卡尔的心灵对事物把握的知识静态性，即他反对一种表征主义的知识观。皮尔斯认为，知识是可错的，知识是一个持续过程的结果，它总是要受到来自理性的批判，只有通过不断地进行自我辩护才能具有稳定信念的后果。真理是探究共同体在足够长的时间后最终会同意的观点。这是皮尔斯解释实在的一种方式，这并不是说我们能够正确地反映实在，而是说，科学探究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一致性定义了我们所说的实在。<sup>③</sup> 据此，在皮尔斯这里，知识是一个长程探究中暂时被探究共同体当作稳定信念而据之以行动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一种陈述可以免于被修正，因为没有人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去思考；而在时间和空间中，关于知识的辩护的正当理由会随着背景条件的改变而改变。

## 2. 皮尔斯对康德先验逻辑的改造

皮尔斯开创了一种三元指号学，直指对康德先验逻辑的改造。康德哲学所意图完成的客观有效性奠基于一意识的综合统一性，即科学知识的先验主体具有遵循先验逻辑的先验结构，据此保证知识的普遍性必然性。这在科学逻辑视野下的现代哲学家们看来，康德的思路不过是一种意识分析，它用先验逻辑替换了洛克、休谟所论述的知识心理学；而真正的科学逻辑应当将工作基础奠定在语言分析上，而不会陷入心理能力的解析。哲学中的“语言转向”使康德的先验逻辑成为不再需要的假设，可以通过科学语言的逻辑分析来完成康德哲学所要完成的知识客观有效性保证，即可以根据表达观念和思想的语法结构分析来寻求客观性基础，而无须进行意识哲学分析。“语法所表达的是一些公众性的东西，找出其中的结构，无

① 荆晶：《黑格尔关于怀疑主义、辩证法与思辨关系的最终确定》，《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② Charles Sanders Peirc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8 vols., vol. 5, C. Hartshorne and P. Weiss eds., Belknap Press, 1935, p. 186 (CP 5: 311).

③ Cf. Tom Rockmore, “Hegel, Peirce, and Knowledge”, *The 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 (New Series) 3 (1999): pp. 166 – 184.

须考虑纯粹的主观性。此外，数学和逻辑的范例还有助于引导哲学进入语法表达的公共客观领域。弗雷格和皮尔斯是这一场转折的关键人物。”<sup>①</sup> 语言转向最初所进行的语义分析不考虑言语情境而使语言格式化、抽象化，致使其“用惟一的形式化语言进行惟一的世界演算，这种新莱布尼茨主义的梦想，已被证明为一个乌托邦，因而那种认为有一个纯粹句法—语义学的科学概念的玄秘的核心思想，根本上也变得站不住脚了。”<sup>②</sup> 这就使语言转向经历了一个由语义向语用的转变，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维特根斯坦的前后期思想转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转变，在皮尔斯那里亦然。

阿佩尔在《哲学的改造》中对皮尔斯哲学进行了一个简洁的概括：“我们可以把皮尔士（斯）的哲学探究理解为对康德先验逻辑的一个指号学改造。”<sup>③</sup> 其实，皮尔斯对康德的“哥白尼革命”是肯定的：“康德所称的哥白尼革命准确说来是从关于实在的唯名论过渡到实在论观点。康德哲学之本质就是认为实在对象是由心灵决定的。而这无非就是说，任何概念和直观都必然地进入到关于某个对象的经验之中，它们不是短暂的和偶然的，而是具有客观的有效性。简言之，把实在看作是心灵活动的通常产物，而不是心灵活动不可知的原因。”<sup>④</sup> 但皮尔斯不赞同康德所走的心理主义的路径，康德式的意识分析应该用“表达”的分析来代替。对皮尔斯来说，所有意识因素都可以在语词中找到相应的东西来表达；先验的统觉统一体无非就是对一致性的认知，而一致性其实是属于每个指号而言的，人在使用语词、指号时就是在表达思想（进行意识活动），人的同一性其实就是思想与行动的一致性。由此，皮尔斯得出一个最终会导向一致性的指号解释共同体：“当我们思考时，我们自身在这个时候是一个指号。那么，一个这样的指号有三个指涉：首先，它是被某个思想所解释的一个指号；其次，它对于某个对象来说是在思想中与对象等价的一个指号；再次，在某些方面或性质上，它是与它的对象相联系的指号。”<sup>⑤</sup>

据此，皮尔斯以三元关系的指号学作为他的探究逻辑的基础，成为对康德先验逻辑的批判性重建的总体方法。在这种探究逻辑之中，每一个具有三元关系的指号又是作为其他三元关系的解释项参与到新的三元关系中，如此，构成了一个无限解释的共同体。在这个进行着无限解释的共同体中，科学命题（知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被转化成无限探究过程的目标，且总会达到关于实在的“意见”会聚。皮尔斯对康德的先验逻辑的改造，最终在皮尔斯的“逻辑社会主义”中完成，他最终诠释了一种只有正在进行着科学探究的共同体才有可能达到真理：“不肯牺牲自己灵魂而要拯救整个世界的人，在他的所有推论中都是不合逻辑的，从整体上来说就是这样。所以说，社会原则内在地植根于逻辑之中。”<sup>⑥</sup>

### 三、皮尔斯和黑格尔在超越基础主义知识论上的差异

皮尔斯和黑格尔在反基础主义道路上的观念趋同已经在他的声明“我的哲学使黑格尔

① 于尔根·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2012，第44页。

②③ 卡尔·奥托·阿佩尔：《哲学的改造》，孙周兴、陆兴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第104页；第89页。

④ Charles Sanders Peirc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8 vols., vol. 8, Arthur W. Burks 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18.

⑤⑥ Charles Sanders Peirc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8 vols., vol. 5, C. Hartshorne and P. Weiss eds., Belknap Press, 1935, p. 169; pp. 220-221.

复活，尽管他穿着奇怪的外衣”<sup>①</sup>中得到最佳说明。而两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差异的阐明是重要的，因为这既代表了哲学思想在时代潮流中的进展，也牵出了现代哲学两种大的思维路径——语言转向后在“语言-符号-逻辑”分析中开展哲学思考与在“现象学-存在论”视域中进行哲学探究——的分野。这种“分野”在黑格尔与皮尔斯的各自哲学思路中已具形状。

### 1. 认知主体的差异：科学探究的共同体 VS. 历史文化的共同体

皮尔斯的哲学要完成某种意义上的“思想解放运动”——重建笛卡尔曾追求的“清楚明白”标准。皮尔斯认为，笛卡尔式一劳永逸地确立评价理论观念的标准与机制歪曲了知识（科学）的产生和证实方式，那种个体性的（预设个体心灵的一致性）、直接性的（非推论性和中介性）、一次性完成的知识产生机制并不是对科学知识的真实理解，而只是一种“虚假的概括”。皮尔斯开创性地重建了对科学知识新的理解范式：首先奠基起一种“有理由的怀疑”的知识发生机制，并在立足于先有之见的基础上建立起可公开检验的信念系统，在充分的主体间探究中形成意见会聚，知识最终成为探究共同体的一致信念。把皮尔斯引向科学探究共同体观念的是20世纪转换的时代主题在哲学上的前期反应，即在祛魅的时代找到理智进展的真正“方法”并将哲学转变为一种“知识”，以揭示人类在科学的道路上与“世界”的关系。“方法”-“知识”-“世界”成为皮尔斯的哲学图景。皮尔斯批评了以前关于科学图景那种从前提到结论或从单独的事实到综合的线性运动，而强调用来支撑科学假设或理论的多重证据、数据、预感和论点。<sup>②</sup>理性的信念（知识）就像一条由多股细线拧成的电缆一样，任何一股本身都不足够充分论证所提出的理论。因此，研究者共同体是认知的主体，它是一个多众的合力体，即只有在一个探究者共同体且同时是一个批评者共同体中，让多重论证的集体力量来检验理性信念，才可以产生称为知识的东西。

皮尔斯视探究者共同体为知识产生主体的理论影响或预示了20世纪一系思想家所进行的工作：库恩、拉卡托斯、波普尔、费耶阿本德等。这一系列思想家都意识到，知识的产生必须去考量历史发展中各种理论的冲突，而且每一个“当下合理”的理论都相关到一系列的理论的合理性说明，评判检验的单元变成拉卡托斯式的“研究纲领”，而不再是孤立的理论标准。为建立知识而出示的证实或证伪（或二者兼具）的证据必须是许多探究者构成的研究者共同体整合后确证的东西。这样，一个无限解释的共同体是皮尔斯认知的主体。

皮尔斯的三维指号学所代表的“科学逻辑”与康德的“先验逻辑”的深刻不同在于，前者是一种“语言分析”，而后者是一种“意识分析”。<sup>③</sup>阿佩尔的这种判断是基于对皮尔斯所做的哲学开创性工作的把握——皮尔斯的思想昭示着以语言转向为核心的“分析时代”的到来。皮尔斯认为，意识是一个模糊的术语，它是无法保障一致性、客观性的；思维是符号运动，一致性属于符号，因为人的意识元素无不对应于符号（语词系统），符号以其自身与符号对象的关系特性及其意义解释的公共性而保障了思想交流的一致性。每一个符号都是

<sup>①</sup> Charles Sanders Peirc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8 vols., vol. 1, C. Hartshorne and P. Weiss eds., Belknap Press, 1931, p. 18.

<sup>②</sup> 参见理查德·伯恩斯坦：《超越客观主义和相对主义》，郭小平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第85页。

<sup>③</sup> 卡尔-奥托·阿佩尔：《哲学的改造》，孙周兴、陆兴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第85—101页。

活的东西，……它的意义不可阻挡地生长着，纳入一些新的因素，扔掉一些旧的。<sup>①</sup>从皮尔斯哲学的运作要素——逻辑、符号——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代哲学家走出意识哲学的清晰思路，这符合他同时作为科学家的身份与意识，这种实证精神使他的将进行知识探究的主体归之于科学探究共同体。

回到黑格尔的时代，关于知识的探究还持留着意识哲学的内在性分析以及宗教生活所造成的世界与卑微的人之心灵的分裂，尽管康德以他的批判性研究推进了客体中的主体作用，使知识变为在主体自身内寻找，并将知识的确定性标准定格在主体的先验结构上。黑格尔肯定康德在知识问题上的扭转（不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寻找知识的真理，而是确立了统合性的“我思”），但批判康德在知识的普遍性必然性上的“一次性成型”。黑格尔要展示认知的真正过程，因为没有一种观念主张是不受历史文化情境所影响或决定的，这是一个真实的过程。黑格尔将历史性引入意味着使认知主体成为某个历史文化共同体的成员。对黑格尔来说，历史条件的力量被视为“战胜一切时间”和“原初的命运”，完成知识惟一可行的道路就是走过所有已经存在过的精神的道路。<sup>②</sup>历史、文化、社会的情境呈现的是一种综合性的实践主体的身份，它的目的是自由。这与皮尔斯的科学探究共同体在表达方式及其侧重点上是有差异的。

这种不同与时代进展在精神氛围与思想表达侧重点上不同有重要关系。皮尔斯所生活的时代，一种纯世俗化的“自然主义”的精神氛围已经在旺盛生长，虽然这个概念有着极其复杂的传统与内涵，但在皮尔斯时代这个概念所表述的总体特点强调的是“科学方法”，其理论核心点在于主张科学方法是包括哲学在内的所有领域中获取知识或可靠信息的唯一方法，因此全心全意接受这种自然主义的科学方法成为谈论知识、信念的可靠途径。皮尔斯是从一个“科学”工作者的角度来描述知识过程及其结论的，他的探讨焦点在于知识的发生机制（符号的解释性运作）、知识的发展机制（主体间的一致性与纠错）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探究方法。

与皮尔斯时代现代科学逻辑下只承认实证性的经验因果相比，黑格尔的时代还承认更多种类的关系，比如那时候的许多生物学家重新引入对最终原因和形式原因的信仰，他们认为这与有效因果的研究是完全一致，实际上也是必须的，因为生物体的各个部分是相互作用的手段和目的……有机体必须被看作是有目的整体。<sup>③</sup>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就表现出受到当时文化议题的这种影响，他并不把经验的实证因果当作解释自然的唯一有效逻辑。黑格尔承认自然界中概念性的、非物质形式的真实存在，这使他比机械唯物主义的自然主义更接近超自然主义，但他否定了谢林的原始生产力概念，这又使他从超自然主义方向倒退一步，最终处于自然主义与超自然主义的中间。他这种“广义的自然主义”者身份使他不会只持有一种对世界的实证性科学方法论解释，“逻辑意义和机械存在对精神、对于在其自身发展运动中的生命的从属地位，却在那些对黑格尔的无偏见解释中显现出来。”<sup>④</sup>他对精神、生命

① C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8 vols., vol. 2, C. Hartshorne and P. Weiss eds., Belknap Press, 1932, p. 130.

② 参见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李秋零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第40页。

③ Cf. Alice Stone, "Hegel, Natural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Nature", *Hegel Bulletin* 1 (2013): pp. 59–78.

④ 约翰·杜威：《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三卷，徐陶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第62页。

这些核心概念的解释是放置在与“实践”“劳动”概念联系中来解释的，因此，进行着认知的精神和生命是“理论行为”和“实践行为”互补的统一体，这是一个进行着外部和内部转变的双重劳动过程，是在对过去时代所产生的制度和文化内容的改造中进行活动。黑格尔在谈到“劳动”概念时，似乎是在谈论绝对理念实现自身的“驱动力”。<sup>①</sup>在黑格尔那里，进行着认知的主体是精神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教化过程的承担者，它是一个自我改造的劳作者共同体（“我们-世界”），其所在实现的是自由。对于这个共同体而言，真正的自由是通过否定性消除通向自由的一切障碍的过程，“自由不存在于静止的存在中，而存在于对所有威胁到自由的事物的不断否定中。”<sup>②</sup>而“只有在世界历史上，精神才能实现它对自由的追求，这是一个过程，一种解放，在这里，通过劳作改造外部性质，通过制度和教化改造内部性质，这是至关重要的。”<sup>③</sup>这里可以看出黑格尔所说的实践（劳动）是作为人类存在根源的总体性社会活动，实践的主体是生存论视域下的复杂主体，不仅仅是强调和突出进行认知探究意义上的科学探究共同体。

对黑格尔来说，历史文化情境是知识产生的条件，但这种语境并不是知识的全部条件，知识也是目的论的，必须要通过知识的目标来解说它。这种对知识的目的论解释使得认知主体这个“历史文化共同体”成为一个朝向目的有机生长的过程表现，它是一连串朝向“自由”的更进一步的理性表现。对黑格尔来说，“精神”在不停地蜕换着它的生存皮囊从而不断地脱胎新生为更为纯粹的精神，所以他用不死之鸟来譬喻。总之，对黑格尔来说，要修复碎片化世界中的各种分裂的哲学意图使他用一种能够带来统一的、有机的、目的论的整体主义的哲学思维来对人类的历史进行解释，这种人类史就是理性在人类精神中的表现史。认知的主体是进行着劳动、进行着话语实践和承认斗争的主体，它是一一个个朝向自我认知的历史文化共同体。

综上所述，黑格尔“不是一个思辨的逻辑学家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家，而是一个哲学的历史学家、一个政治和社会理论家、一个关于我们的伦理学问题和文化同一性危机的哲学家。”<sup>④</sup>这使他的哲学呈现出一种“现象学-生存论”的哲学图像。而皮尔斯则是以数学家、逻辑学家和科学家的身份来进行哲学研究，从可操作、可计算的科学层面来界定知识的产生机制和认知主体，所以科学探究的共同体是认知的主体。

## 2. 认知目的的差异：世界的实在结构的一致性揭示 VS. 精神（意识）的自我认知

皮尔斯要实现笛卡尔传统的哲学进行改造，从有关确定性的知识论转向有关现实性的实践论，也就是将以认识论为中心的传统形而上学改造为一种强调探索和实践过程的实践哲学。<sup>⑤</sup>他认为对世界的可靠信念的建立才真正有助于人们的行动，而可靠信念只能由社会共同体不断探索取得，笛卡尔从“我思”出发超不出自我的狭隘范围，并不能得到可靠的信念。皮尔斯认为，逼近于实在的信念是不同领域的不同研究结果彼此支持、彼此出示证据后商讨的结论，这绝不是个人的事情，而是一个社会过程；这个过程在依据科学探究方法而得

<sup>①③</sup> Emmanuel Renault, “The Naturalistic Side of Hegel’s Pragmatism”, *Critical Horizons* 2 (2012): pp. 244 – 274; pp. 244 – 274.

<sup>②</sup> G. W. Hegel,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World History*, H. B. Nisbet tra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48.

<sup>④</sup> Allen W. Wood, *Hegel’s Ethical 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5 – 6.

<sup>⑤</sup> 参见刘放桐：《皮尔士与美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出的结论和所形成的信念都只是相对于其所出示的证据而言，当有力的新证据出现时，就要依据新证据的充分讨论对原有信念和结论进行修正。皮尔斯用知识的“逼真性”来表达这种不断修正错误的过程。这就是他所提出的著名的可错论。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皮尔斯哲学的知识态度：关于探究对象在科学的方法（科学态度）下的多众的一致性。

在科学态与科学方法下，皮尔斯陈述了一种可知的世界图景：真正的实在并不是不可以被人所认知的，康德式的自在之物是“无意义的添加”<sup>①</sup>；关于世界的知识（自然的规律、种类）是需要科学探究去发现的事情。这些规律、种类独立于任何人认为它们是如何的，潜藏在我们所感知的特殊事物或事件之中。所以，探究的进程当中，那些因个别探究者的特殊性偏好或特殊性境遇造成的探索“任意、偶然的因素”都终将随着探究进程的继续最终被克服。<sup>②</sup> 在皮尔斯那里真理的“真是一个陈述与一个理想极限……的一致，无限的探究进程会把科学的信念带至那个极限。”<sup>③</sup>

而回到黑格尔关于认知问题上来，我们会看到非常不同的论述。黑格尔整体性思维显现的认知图景是思维与世界的同一，即认知者的充分自我认知过程就是世界内容的显现过程。把握黑格尔的认知目的有三个要点：首先，黑格尔的认知目的是实现对认知本身的认知，即理性、精神、意识的自我认知。其次，认知的真理是达到普遍性，那是本质性的东西。再次，认知目的的达到是一个辩证的、运动的过程。

黑格尔认为，从笛卡尔起，哲学才进入了新时代，因为他确立了思维或自我意识是真理的本质环节。<sup>④</sup> 笛卡尔从自我意识开始建立确定性的知识追求，而对于黑格尔来说，绝对真实的东西总是并且仅是从它自身开始和结束的。黑格尔常用“意识”和“知识”这两个名称来表示同一个东西，这两个名称是相互阐释的。<sup>⑤</sup> 他在宗教哲学的讲座中就以“上帝”这个事例来说明真正的知是自我认知：“上帝是可知的，因为这个上帝作为精神的本质是自我识别的，所以将自己视为有限规定中的对象。”<sup>⑥</sup> 这个主张意在于说明，当我们把自己看做是思考的“我”时，我们就实现了自我超越，并实现了思想本身内在的自我分化。上帝的概念就是被拟人化了的绝对精神，这是能够进行自我认知的自我意识。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分析了知识的产生：意识的辩证运动（意识本身与“为意识”的对象的关联运动）使知识成为“为我们”的存在，也就是人们称之为“经验”的那种东西。<sup>⑦</sup> 在“经验”中，意识者、被意识的东西和表象这三者是“共属一体”的。<sup>⑧</sup>

在黑格尔那里，知识是精神认识自己的过程，准确说来，是绝对精神认识自己的过程，人类从认识这种理性当中认识到自己的“理性”，从而获得了知识活动的趣味，并意识到了意识的自由。意识（思想）的这种自由表现在实践上即实践趣味运用着、消耗着对象，表

①③ C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8 vols., vol. 5, C. Hartshorne and P. Weiss eds., Belknap Press, 1935, p. 367 (CP 5: 525); p. 394 (CP 5: 565).

② Charles Sanders Peirc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8 vols., vol. 8, Arthur W. Burks 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 17–18 (CP 8: 13).

④ 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王太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第69页。

⑤⑧ 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5，第163页；第164页。

⑥ G. W. F. Hegel,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 (1827)*, Peter C. Hodgson ed., R. F. Brown, P. C. Hodgson and J. M. Stewart tra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16.

⑦ 参见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62，第67—68页。

现在理论上即理论趣味镇静地思索对象，保证它们在它们本身并不是什么不同的东西。<sup>①</sup> 知识作为人类思想的语言命题（狭义的知识）是人这个存在之自由象征（黑格尔对此的表达是“人类不思想的时候是不自由的”<sup>②</sup>），这种自由的根基在于：作为理性体现的思想“直接包含着‘存在’的调和；‘思想’和另外的东西的统一已经在本身中出现，因为‘理性’现在既然是‘外在的东西’和‘自然的东西’的实体基础，同时又是‘意识’的实体基础。”<sup>③</sup>

黑格尔认为，精神概念在逻辑上包含了它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是形式又是内容。黑格尔在这里表现出受斯宾诺莎主义的决定性影响，认定精神或思维扎根于普遍的生活，它与万物之真理保持一致，并能直接分享其无限性。这种泛神论的影子使黑格尔与皮尔斯在科学世界观的影响下对思维的运作进行符号化分析成了非常不同的论述方式。虽然黑格尔也重视作为精神外在符号的语言，但在黑格尔那里，作为精神表现的语言其首要性是普遍性，因为它把感性的、单一的、外在的东西升华为与自身同一的东西。语言在思维的运作中表现着思维本身的普遍本质（黑格尔认为，当我们思考普遍时，就是思维在思考自身）。

当黑格尔把“意识”与“知识”表示为同一个东西的时候，意识要建立确定性所经历的一系列历史形态就是知识的历史（“意识自身向科学发展的一篇详细形成史”<sup>④</sup>）。而且，历史并不回避那些犯错误的时刻，黑格尔用不要“害怕犯错误的顾忌”<sup>⑤</sup>来将历史性注入到人类认知过程中，这是对康德以及笛卡尔主义的最重要的革新。黑格尔在这里要呈现的是，作为话语实践有机体的人类是通过持久的权力对话（角力）在社会进程（历史）中显现理性的形式——人类认知中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真理的话语实践受制于历史情境，但受制于历史情境的现实绝不是真理的最终文本，因此，可修正性、易错性总理藏在认知的前进中，提供激活真理的动力让理性显现自身。总之，黑格尔的认知是这样一个辩证的、运动的、认知目的即是自我认知的过程，它与皮尔斯所阐述的认知目的有着巨大的差异。

在皮尔斯那里，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傲慢”需要被世界的实在结构压制和纠正，黑格尔的辩证历程需要被自然主义的经验方法所代替。所以，于皮尔斯而言，探究的共同体所进行的认知活动的最终目标是揭示世界的实在结构（“实在”与“一致性”共同构成理解皮尔斯思想的关键点），而不是黑格尔所认为的求知最终是为达到绝对精神的自我理解。总之，皮尔斯在自己的论述中虽然越来越频繁地强调自己与黑格尔的一致性，但他与黑格尔直接强调知识的历史特征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皮尔斯更偏爱将知识表述为是通过一个科学探索过程而获得的，它更表现出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论的特征。皮尔斯对康德先验逻辑的指号学改造让我们看到在知识问题上一种共同体旨趣对个体旨趣的替换，这种思路在哲学上的影响后效是巨大的，“主体间性”就是一个后来哲学的思考中心。正是基于皮尔斯的自然科学方法的思维范式，对于黑格尔把绝对精神的历史演变作为认知问题的内核这种神秘主义的思想基调，皮尔斯是无法接受的。认知的目的对于皮尔斯来说是对世界实在性的真正确证，对于黑格尔来说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认知，这成为两者不能汇流的思想差异。

①②③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第410—411页；第410页；第410页。

④⑤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62，第62页；第58页。

#### 四、结语

虽然当下哲学思考氛围好像已失去“对绝对的体味”（黑格尔形而上学的灵魂）的思想旨趣，但正如黑格尔自己所言，伟大的人物总会迫使人们理解他。黑格尔哲学在当下的复兴不仅仅在于为揭示马克思主义的根源或为实践哲学提供的思想能量，它还为分析哲学传统中的一些重要思想家提供解题思路（比如麦克道威尔和布兰顿）。而随着黑格尔哲学的实用主义气质被反复提及，并且涉及到新实用主义家族，考察黑格尔与实用主义哲学家的思想关系成为一项值得去做的思想任务。皮尔斯作为奠定实用主义地基的思想家，其哲学思想与黑格尔哲学在对待知识问题上的反基础主义归同表明了思想观念发展的现代共同趋势。这种现代转向的共同势能被两位思想家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在知识问题的探讨上。

黑格尔和皮尔斯都批判康德式的先验哲学，两者都要走出笛卡尔传统的二元哲学；在知识问题上的反先验性、反表征主义和可错主义都是相同的。这些特征已经成为大多数现代思想者们关于知识的基础共识，也使他们的思想成为当下知识论前线上讨论议题的必要思想资源。但两者的哲学气质却差异巨大，令研究者们一般不易将两者放置在某个论题的“战友或伙伴”角色中。两者的差异首先在于他们的哲学立场的根本性假设不同。皮尔斯把世界的实在性作为认知的基本预设，而黑格尔则把绝对精神的历史性演变作为认知的内核；这使皮尔斯具有现代科学中体现的理性精神，而黑格尔哲学则表现出了“绝对”之力量的神秘性，而这是皮尔斯所拒绝的（皮尔斯哲学本身就是走出意识哲学之神秘性的尝试）。这种差异也引发我们对哲学与时代、现实问题的关系的思考。黑格尔致力于探究一个现代主体的精神成长问题以及国家、民族、社会的现代转型问题，所以除了逻辑学等传统形而上学议题之外，黑格尔哲学表现为对理性与自由、承认与法权、个体与正义等问题的讨论，力图探究政治性的、社会性的生存论层面的问题。这真正贯彻了他自己所主张的哲学要拥抱现实、把握时代并积极介入到现实生活问题的运动中的主张。皮尔斯把关于世界的实在性的科学揭示放置在其哲学的核心地位，并用数学的、逻辑的、符号的思维方法与术语来进行哲学表达，这使他更具有一种与自然科学家类似的气质，从而保持了与政治性的、社会性的议题的距离。这就导致其哲学虽然强调探究的过程性、可错性与公共性，却有一种无涉政治与具体生存处境的“中性”。因为在皮尔斯时代，将哲学、人文学科自然科学化的抱负源自于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及其精确语言“改造”哲学的时代筹划，这种抱负导致了后来的“语言转向”的后效及分析哲学的兴起。分析哲学现在向黑格尔哲学寻找资源，这就说明了哲学思考或知识主张向时代议题寻求滋养的内在要求。

（作者单位：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毛竹）

## Abstracts of Main Essays

**On the Dual Pursuit of Marx's Ecological View :  
A Response to the Questioning of the Dark Green Thought**

Han Zhe &amp; Mu Yanjie

Marx demonstrated a truly profound and systematic ecological world view for mankind with his analysis of "Ontological Pursuit" and "On Practice Pursuit". To sum u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ual pursuit of Marx's ecological view is mutually supportive. The "Ontological Pursuit" undertakes the task of explaining the world in the way of "pursuing human liberation", and the "On Practice pursuit" undertakes the task of changing the world in the way of "pursuing communism". In current Western academic community, a radical ecological view (dark green trend) questions the dual pursuit of ecological attributes and hopes to solve ecological crises by enhancing people's ecological moral realm. Therefore, by responding to the questioning of the dark green trend, on the one hand, it can be revealed that "the dark green trend is an abstract ecological view that is detached from human practice and history"; on the other hand, it can demonstrate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the Ontological Pursuit of Marx's ecological outlook and the pursuit of On Practice.

**Contemporary Western Marxism's Critique of Financialization :  
The Temporalization of Financial Capital and the Extreme  
Development of Monetary Proliferation**

Niu Ziniu

Global capitalism has shown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financialization since the 1980s. Western Marxists have developed rich critical theories of financialization through the "philosophical-political economic" interdisciplinary discourse. These theories, based on the logic of "crisis-fix", analyzes the temporalized operation of financial capital and interprets the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s a "temporal tension". At the same time, it outlines the extrem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 of "monetary proliferation"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indicating that the effect of capital is increasingly deviating from the direction of "creating civilization". However, these critical theories also have distinct regional and national limitations, which prompts us to critically explore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contemporary China from the viewpoint of local experience.

**Hegel and Peirce's Anti-foundationalist View of Knowledge**

Yang Xingfeng

Hegel's contribution to the problem of knowledge (from the "society-reasoning-history" of tripartite structure to explain knowledge) became the thought resource of Pittsburgh School. For the philosophers (Sellars, Brandom and McDowell), Hegel was regarded as a pragmatist. In fact, the anti-foundationalism of Hegel's philosophy on the problem of knowledge has been cited by "the father of pragmatism" C. S. Peirce as "My philosophy is to revive Hegel." Peirce and Hegel are similar in their anti-foundationalism of cognition, but there are also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ir philosophical temperaments on this matter, which can be seen from these two asp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gnitive subject, the differences show as "community of scientific inquiry" vs. "community of history

and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im of cognition, the differences show as “consistent interpret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reality” vs. “spirit seeks self-knowledge”.

### **The Possibility of Supererogation**

Tang Yingying

Supererogatory actions are typically defined as valuable but non-obligatory actions. The concept of supererogation is faced with two difficulties: “the value overflow problem” and “the moral exemplar problem”. While the value overflow problem concerns how a supererogatory action might possess extra value besides the value of fulfilling moral obligations, the moral exemplar problem concerns how noble agents might be justified in believing that the supererogatory actions are obligatory. In response to the value overflow problem, by clarifying many conceptual confusions, the author proposes that the bearers of the additional values of supererogatory actions are the virtues of the agents. In dealing with the moral exemplar problem, by distinguishing two dimensions of evaluation, moral metaphysics and moral decision-making, the author aims to argue that an agent might be justified, as far as moral decision-making is concerned, in believing that their supererogatory actions, metaphysically speaking, are obligatory.

### **Rousseau on *Amour-propre* and Freedom**

Wang Xinghu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mour-propre* and freedom for Rousseau has been misread as rival, namely, the rise of *amour-propre* leads to the loss of freedom, and eradicating *amour-propre* is necessary for obtaining freedom. I try to make clear the proper relationship between *amour-propre* and freedom, i. e. , when *amour-propre* manifests itself as a desire to have equal standing with others, one’s *amour-propre* supports one’s freedom, and vice versa. This new understanding of *amour-propre* and freedom, reveals the mu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psychology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 and provides a solution for how Rousseau can escape Isaiah Berlin’s accusation of him as a totalitarian.

### **Why Should We Study African Philosophy?**

Wang Jun

African philosophy is not a systematic history of ideas consisting of a sequence of philosophers and classical works, nor does it lack a system of concepts that can be passed on for discussion. Therefore, the study of African philosophy so far does not constitute a systematic and complete academic history, but rather a discussion around a number of concepts and issues. However, on the whole, the themes of African philosophy, the underlying concepts, the modes of discussion, and the perspectives of issues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philosophy we usually understand, which fully identifies the uniqueness of African philosophy. This uniqueness makes African philosophy another “other” relative to us, and the intervention of this other dimension breaks the familiar binary system of comparing the East and the West,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self-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the redrawing of the map of world philosophy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